

主编 孟志东 恩和巴图 吴团英

达斡尔族研究

第一辑

内蒙古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学会

22.942
342
131

达斡尔族研究

第一辑

主 编

孟志东 恩和巴图 吴国英

内蒙古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学会

一九八七年·呼和浩特

编 印 说 明

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具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之一。达斡尔族以自己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英勇无畏的精神，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开发和捍卫祖国神圣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从历史、语言、文学到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全面研究达斡尔族，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全国解放后，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和其他民族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投身到这块沃土，辛勤耕耘，已获得累累硕果。特别是自一九八〇年内蒙古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学会成立以来，达斡尔族研究更加活跃起来。仅在一九八一、八三、八六年三届年会中就收到论文和资料一百多篇。达斡尔族研究已成为我国民族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现为了进一步促进达斡尔族研究工作，更好地为我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我们决定开始选编这部《达斡尔族研究》。

这次编发的《达斡尔族研究》第一辑、第二辑，是由孟志东、恩和巴图、吴团英三同志主编的。第一辑收进了有关达斡尔族历史、经济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三十一篇论文和资料；第二辑收进了有关达斡尔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论文、资料三十篇。这些论文和资料，除有一部分选自国内社会科学类刊物和书籍以外，大部分是会员们提交学会成立大会和三届年会的。根据“双百”方针，对选入的各篇文章，我们除作了必要的删节和文字处理外，一律保留了原文的观点和解说。未选用的篇目及其作者姓名，均附于本书第一辑。

在编印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统战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办公室、内蒙古民委、内蒙

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文化厅、内蒙古社联等部门的热情支持。内蒙古日报社印刷厂的师傅们为赶排本书加班加点，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党的教育》杂志社的毅松同志为本书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对上述给我们以极大鼓舞和热情支持的单位和个人，我们深表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遗漏、失误和欠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学会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五日于呼和浩特

目 录

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研究概况(代序)	
.....	蒙和(1)
十五至十七世纪达斡尔族历史概述	
.....	莫日根迪(14)
契丹后裔的达斡尔族社会(节录)	
.....	阿勇巴图(26)
试论达斡尔的族源问题	陈述(41)
达斡尔族历史札记	敖兴然(56)
从契丹小字解读探达斡尔为东胡之裔	
.....	刘凤翥(69)
从“訥耶”、“尼耶”的由来和文字传说	
看达斡尔族源	巴图宝音(77)
明末清初达斡尔族的称呼	郭博乐·雪鹰(81)
明末清初分布在黑龙江中上游的	
达斡尔诸城屯	苏钦(84)
试论十三至十四世纪达斡尔族	
与蒙古族的关系	玉山(95)
达斡尔族源研究概况	乌尼日(101)
十七世纪达斡尔族人民的抗俄斗争	
.....	傅朗云 敬知本 杨旸(113)
达斡尔族在雅克萨战役	吴德渊(121)
楚勒罕与奇三告状	乌力吉图(124)
敖里莫音反对军阀的斗争	蒙和(131)
骑兵四十二团南下参战记	

.....鄂景海 恩勤巴图 (137)	
解放初期的莫力达瓦旗.....苏荣扎布 (142)	
爱国诗人敖拉·昌兴生平述略	
.....阿·恩克巴图 额尔根巴雅尔 (147)	
镇国公成德略传.....阿·恩克巴图 (153)	
我们所了解的郭道甫	
.....阿·恩克巴图 额尔根巴雅尔 (159)	
反日民族英雄——凌升	
.....阿·恩克巴图 额尔根巴雅尔 (183)	
略论达斡尔族的氏族制度.....满都尔图 (195)	
达斡尔族的习惯法.....莫日根迪 (209)	
近代布特哈地区的教育事业	
.....卓日格巴图 (217)	
莫旗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初探.....巴音蒙和 (226)	
略谈发展达斡尔地区毛皮动物养殖业	
.....吴德渊 (232)	
关于发展畜产品加工业的构想.....若仆 (236)	
“阿穆尔”的由来.....王鹏林 (243)	
达斡尔族的村落、庭院及房屋.....吴依桑 (253)	
达斡尔族的大轮车制作技艺及其用途.....吴依桑 (259)	
达斡尔摇篮.....郭来迪 (264)	
附：来选用文章目录..... (267)	

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研究概况（代序）

蒙 和

达斡尔族作为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具有英雄气概和较高文化的民族之一，曾经为祖国的统一、保卫边疆的斗争做出卓越贡献。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关于达斡尔族的情况在过去是很少被人知道的。虽然达斡尔族的人文志士也主动地探索了自己民族的历史，搜集整理了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但是，为历史条件所限，他们的成果并不显著。只有到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领导下，随着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和各方面事业的发展，有关达斡尔族的研究工作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尤其是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为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下面就我所知，简述这方面的概况。

一

“达斡尔”这个族称始见于我国史乘，是在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当时在《清实录》二十二卷上书为“打虎儿”，后来又以达瑚尔、达胡尔、达呼里、达古儿等多种写法，屡见于清朝史料。从《清实录》这部历史文献来看，对于达斡尔族，从清初开始就有记载，例如：

“黑龙江地方头目巴尔达齐，率四十四人来朝。”（天聪八年，即一六三四年）“可令索伦部来朝头目巴尔达齐，速还国。”（天聪八年，即一六三四年）“赐萨哈尔察部落来贡貂

狐皮头目巴尔达齐、额内布、萨泰等三人蟒缎朝服。”（天聪九年，即一六三五年）这里被称为“黑龙江头目”、“索伦部落头目”、“萨哈尔察部落头目”的巴尔达齐，现已查明是达斡尔人。

清朝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华灵阿（达斡尔族莫日登氏人，尼尔基佐领）利用业余时间，注意典籍及有关档案，参以古老传述轶闻¹，用满文写出了第一部专著《达斡尔索伦源流考》。尽管这部书的论据和推断还不尽完善，但在当时来讲，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它是第一次从古书、档案材料中把认为有关达斡尔族的材料摘录了出来，并结合传自古代的民间传说加以考证推论，为达斡尔族族源问题提出了一家之见。同时，它又从满洲旧档案中把达斡尔人南迁以来的史料做了初步整理。这对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此书由瑞永同志汉译，有油印本。

可称为第二本有关达斡尔历史专著的书是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出版的《黑龙江乡土录》。郭克兴在该书中用不少篇幅摘引了各种典籍中涉及到达斡尔族的有关记载，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是赞同达斡尔为“契丹遗裔”说的。郭克兴系讷河县达斡尔族郭博勒氏人，具体身世不详，待查。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阿勒坦噶塔和孟定恭二位先生分别写出了《达斡尔蒙古考》和《布特哈志略》。前者从历史、语言、习惯等方面认为达斡尔是原蒙古塔塔儿部后裔。虽然这书的论据等尚有待进一步商榷，但在族源研究上也提出了己见。对当时及其后达斡尔人报称蒙古方面提供了历史根据和新的论点。因此，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好多知识分子都以蒙古人的身份，积极参加过蒙古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如海拉尔地区郭博勒氏的莫尔色，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始人之一。布特哈地区开阔浅屯的鄂序元（阿勒坦噶塔）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也到外蒙参加了革命工作。孟定恭是布特哈地区达斡尔族莫日登氏人。他在《布特哈志略》书中对于布特哈地区的风土人情等作了较具体的介绍，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书由辽海

书社印行，其毛笔手稿本于一九六八年由台湾影印出版。

伪满洲国时期，莫力达瓦旗西瓦尔图屯的钦同普先生（达斡尔族莫日登氏人），写了一本《达斡尔民族志稿》。他对达斡尔族在清朝前后的情况记述较详，对达斡尔风俗习惯等也做了较真实的描述。

这个时期有个日本人叫池尻登，在布西农业讲习所任教期间，在莫力达瓦旗进行了一些调查了解，并参考有关史料，写出了一本《达斡尔族》，由当时满铁株式会社出版。该书已由奥登挂同志汉译内部铅印。

一九四五年“九三”前后，何维忠写了一本《达古尔蒙古嫩流志》（初稿），他是齐齐哈尔达斡尔人。该书已有翻印本。

此外，有关达斡尔族情况的记述，也散见于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某些地方志和史料上，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在语言方面，达斡尔语为一个独立语言，这点很早以来就为世人所公认。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其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影响和限制。聪慧的人民是不甘落后的。在清朝时期以及民国时期，达斡尔人曾积极学习并掌握满汉语文，出现过不少文人才子。到了本世纪初叶，达斡尔族知识分子们致力于创立本民族的文字，借用斯拉夫和拉丁字母创造过达斡尔文字，并在部分学生和群众中进行了试教工作。海拉尔、布特哈地区的部分达斡尔人，曾用这种文字写信、记录歌词等。但在日伪统治下，这个文字未及推广就夭折了。

达斡尔族的文化艺术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口头文学十分发达，反映了达斡尔族人民的英勇、质朴、善良的性格，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妒恶如仇的气概。这些神话、故事、传说、寓言、诗歌、童话等一代一代传下来，成为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每当晚饭后，孩子们围坐在奶奶或母亲身边，聚精会神地倾听她们讲述斗“莽盖”、莫日根降妖复仇、仙女下凡、阿日格托智胜强霸等故事，那些结合实际生活的“农耕谣”、“伐木歌”、

“打渔歌”等诗作，使人们百听不厌。而具有训导意义的《戒酒歌》、《戒赌歌》、《戒色歌》、《劝学篇》等作品，都使听者频频点头。还有民间舞蹈路日给勒、即兴山歌扎恩达勒等，以及说唱文学。精通满汉文者把《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汉族各种名著边看边译读出来，很受听众欢迎。当然，文艺的形式还有很多。

达斡尔族虽然是一个人数不多、没有文字的民族，却能克服重重困难，既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又丰富充实了它的内容，使自己成了具有较高文化的民族。但是，在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下，在日伪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下，不但政治上无自由可言，经济上也十分贫困，因而文化的真正发展是不可能的，更谈不上真正民族历史语言文学的研究了。

二

达斡尔族历史、语言、文学研究的真正开展，是在本世纪五十年代达斡尔族被确认为单一民族以后的事情。一九五一年在乌兰浩特的达斡尔族干部在东部区党委夏辅仁同志^②的直接授意下，召开了座谈会，讨论达斡尔人的民族成分问题，并写出书面材料上报中央和内蒙领导机关。莫力达瓦旗也召开了老年人座谈会。

一九五三年，中央为了搞清达斡尔人的民族成分问题，组织专业人员到达斡尔人聚居地区进行了调查了解，同时也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然后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确切史料，确认了达斡尔为单一民族。从此达斡尔族以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的身份，开始了全面发展的历程，有关达斡尔族的历史、语言、文学研究工作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就在这次调查中专家们经过广泛搜集史料，进行研究后写出的调查报告，在史料的丰富、成果的质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人的水平，为进一步

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如傅乐焕同志的《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分识别问题》，王静如同志的《关于达呼尔语言问题的初步意见》，林耀华、王辅仁、阿勇绰克图等同志的《达呼尔氏族、亲属和风俗习惯的调查报告》，陈述同志的《关于达呼尔的来源》，傅乐焕同志的《关于“萨吉尔迪汗”和“根特木尔”的资料》等等，不但使研究达斡尔族的有关问题有了良好的开端，而且直接推动了这些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孟希舜同志编写了《达斡尔民族志略》（初稿），并搜集整理出《达斡尔族舞春集》。

一九五六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全国少数民族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在这次大规模的调查过程中，除有许多方面的专家直接参加外，还吸收了各民族的专业人员，历时数年时间，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到达斡尔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的有已故的学者额尔登泰同志，有蒙古族史学家珠荣嘎同志，以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满都尔图等同志。他们收集到了有关档案、传说、故事等大量资料，并整理成册，为研究工作积累了宝贵财富。一九六二年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蒙分院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和《达斡尔族简史简志合编》。通过这些，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达斡尔族近五百年的历史梗概，也为继续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又组织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对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全面调查。到达斡尔族地区进行调查的是第五调查队，该队由巴达荣嘎、拿木四来等同志率领。他们不但记录积累了有关达斡尔族的语言、语法、词汇等方面的资料，经过科学分析进一步弄清了达斡尔语的系属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达斡尔文字方案（草案）》。

一九五六年五月，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科学讨论会在呼和浩特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内蒙、黑龙江、新疆等地的达斡尔

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代表。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为达斡尔族创立文字的问题，并对第五调查队提出的《达斡尔文字方案（草案）》进行了深入讨论，一致同意将该方案修改充实后交下次专门会议讨论通过。

当年十二月，在中央有关部门和内蒙党政机关直接领导下，在呼和浩特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达斡尔语文科学讨论会。全国各地达斡尔族各界代表一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央民委、科学院都派人指导，乌兰夫同志亲切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会议经过深入讨论，庄严地通过了以斯拉夫字母为形式，布特哈方言为基础方言，纳文语音为标准音的达斡尔文字方案，并就如何推行文字等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

会后，在内蒙党委直接关怀下，成立了以郭文通、乌如喜业勒图、蒙和、卜林等同志为首的，包括巴达荣嘎、拿木四来、乌珠尔等同志在内的由十七名委员组成的达斡尔语文工作委员会，并从内蒙、黑龙江等地抽调了工作人员，一方面大力宣传贯彻语文科学讨论会的决议，另方面积极开展了各项具体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出版了《达斡尔识字课本》、《达斡尔文读本》、《达斡尔民间故事》（第一集）、《各国民间故事》（第一集）、《黄继光的故事》、《达斡尔文正字法（初稿）》等七本书，还出版了《达斡尔语文通讯》等刊物。一九五七年七月，在呼和浩特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达斡尔文字训练班。当时的工作是很有生气的，在达语会工作的同志们是做出了贡献的。

后来虽然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创文工作中途停顿，但确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恢复和贯彻落实的情况下，有关达斡尔族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又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展起来了。

首先，达斡尔族的历史研究被提到了空前的地位。特别是开始注意研究了达斡尔族在黑龙江北岸时期为保卫祖国领土而

英勇抗击沙俄侵略的历史。过去我们无法看到的好多档案被发掘了，外国人写的有关书籍也被翻译出版，在全国各地刊物上陆续发表了有关的研究论文。例如：一九七七年杨旺等同志，在《吉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十七世纪达斡尔族人民的抗俄斗争》，赵展、吴梦龄同志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三期上发表了《巴尔达奇墓碑的发现和碑文略释》。一九七九年十月《黑龙江日报》发表了穆毅中同志的《达斡尔族的卓越爱国者——巴尔达奇》一文。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内蒙古社会科学》发表了孟志东同志的《十五至十七世纪达斡尔族历史概述》论文。凯英同志也写了《新疆达斡尔族概况》一本资料。郭冠连同志写的《郭道甫略传》，也在《内蒙古文史》上发表。

其次，达斡尔族的语言研究也被提到议程上了。一九七九年在昆明召开的民族科学讨论会上，内蒙古大学的清格尔泰教授提出了为无文字的少数民族设计字母的设想（如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在北京召开的少数民族科学讨论会上，内蒙古大学的恩和巴图等同志提出了为达斡尔族创文的意见和文字方案草稿。

在文学方面，除了在各种刊物上陆续发表民间文学作品外，一九七九年六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孟志东同志编译的《达斡尔族民间故事选》。《电影文学》发表了《傲雷·依兰》的电影文学剧本，不久，拍摄并公演了该大型彩色故事片。

总之，随着拨乱反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进一步落实，达斡尔族的历史、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复苏。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进一步推动研究工作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由蒙和、巴达荣嘎、奥登挂、斯尔古楞、呼思乐、巴图宝音、孟志东、恩和巴图等八名同志提出了成立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研究学会的倡议，立即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和响应。然后经有关领导机关批准，于一九八〇年四月，在呼和浩特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内蒙古自治

区有关盟、市以及呼和浩特地区代表和研究人员近百人参加了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黑龙江达斡尔族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内蒙党政领导同志参加了成立大会。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廷懋同志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达斡尔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并对如何开展研究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周北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王海山等同志也都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不少同志向大会提交了有关达斡尔族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最后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学会的三十四名理事，十七名常务理事，正副秘书长和正副秘书长，并提出了学会活动和科研工作的设想。

学会的成立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重视，特别是达斡尔族干部群众及知识界，都积极热情地投入到研究行列，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一九八一年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上，就有数十名同志提交了具有一定水平的学术论文。这在达斡尔族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把有关达斡尔族研究工作推进了一大步。一九八四年黑龙江省成立了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学会，新疆地区的达斡尔族也正在做成立群众性学术团体的努力。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大好形势的发展，有关达斡尔族的研究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专业和业余研究人员不仅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而且编写各类读物、编纂辞典、进行比较研究、著书立说的同志逐年多了起来。从一九八一年到目前的情况看来，可称为研究工作发展标志的有这么几种表现：

第一、编写整理和出版了有关达斡尔族的综合性书籍和资料。在中央民委决定和内蒙古民族问题五种丛书领导小组的指导下，一九八六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孟志东同志编著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概况》和《达斡尔族简史》，满都尔图、珠荣嘎二同志整理的《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此外，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族史的学术论文也在不断增多。

第二、讨论通过了《达斡尔语记音符号》。鉴于达斡尔族投

有正式文字，为了研究工作的方便，由学会委托巴达荣嘎、恩和巴图、孟志东等同志，在恩和巴图原写的方案基础上研制了《达斡尔语记音符号》，并在第一届年会学会理事会上正式讨论通过了。它的诞生，受到了学术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由于这个记音符号简便易学，很快被人们掌握，在没有正式文字的情况下，有些地区已把它当作拐杖使用。近年来，先后在内蒙呼和浩特、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盟等地举办几期试教《达斡尔语记音符号》学习班，效果和反映都很好。现在恩和巴图等同志已用这个符号编出了《达斡尔民间文学资料》（第一集）、《达斡尔语记音符号试用教材》。乌珠尔同志编写了《达斡尔语言》（内部打印稿），一九八二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仲素纯同志编著的《达斡尔语简志》。一九八五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凯英老人编的《达斡尔、哈萨克、汉语对照词典》。一九八三年以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拿木四来和哈斯额尔敦合著的《达斡尔语与蒙古语比较》，恩和巴图同志编的《达汉小词典》、《达斡尔语词汇》、《达斡尔语话语材料》。恩和巴图同志编著的《达斡尔语和蒙古语》一书，也在排印之中。上述书籍的出版，对达斡尔语言的研究和比较研究，不但具有着示范作用，而且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三、达斡尔文学方面的出版物不断出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先后出版了呼思乐、雪鹰二同志合编的《达斡尔民间故事集》、杨士清同志编译的《达斡尔族民歌》、呼伦贝尔盟文联和文化局编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歌》、哈斯巴根同志编写由吴团良等同志画的以达斡尔族神话故事为题材的连环画册、郭博乐·雪鹰同志编写的少年儿童读物《莫力达瓦山下》、巴达荣嘎和门德苏荣二同志蒙译的《达斡尔族诗歌》、塔娜同志编译的《达斡尔民间故事》等书。此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达斡尔族民间故事选》一书，至今已经翻译成蒙文、哈萨克文、英文出版。至于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论文，越

来越多地发表在各种报刊上。

第四、古籍史料的翻印和翻译工作正在取得进展。近年内已经翻印和翻译的史料有：阿勒坦嘴塔著的《达斡尔蒙古考》、钦同普编著的《达斡尔民族志稿》、何维忠编的《达古尔蒙古嫩流志》、池尻登写的《达斡尔族》、《有关达斡尔、鄂伦春与索伦族历史资料》（两辑）等。

第五、莫力达瓦旗文化馆编译了《达斡尔族歌曲选》，新疆塔城县文化馆阿西尔文化分馆编译了《达斡尔民歌选编》，毕力德等同志搜集和译了《昌兴诗歌集》。此外，莫力达瓦旗编排的许多民族节目受到了自治区内外观众的称赞。《傲雷·依兰》大型彩色故事片已译成达斡尔语演出，内蒙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以曲棍球为题材的电影《莫力达瓦人》。

上述情况表明，在仅仅几年里，一个人口不多、又无文字的民族，能有如此成果已经和即将问世，确非易事。这也证明我们达斡尔族的广大群众及其知识分子，对于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事业，是勤奋努力的，表明党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对达斡尔族的文化事业和科研工作是重视和支持的。正因为有这些条件，我们的事业正在蒸蒸日上。

三

当然，我们的研究工作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困难。首先我们的专业研究人员很少，水平高的更少，而且大有青黄不接和后继无人之患。客观上至今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绝大多数同志是利用业余时间兼搞研究工作的。学会也只是个群众性团体。没有专职人员，无力解决许多具体问题。内蒙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虽然是我们学会的挂靠单位，但是由于达斡尔族科研人员甚少，又有各自的研究任务，无法拿出更多力量来管学会工作。这些都是我们当前深入开展研究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内蒙古社

会科学院的领导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在一九八一年举行的学会首届年会上，提出过关于单独建立区内三个少数民族研究所的方案。但是主要因为领导班子的变动，至今尚未成立这个研究机构。

我们不能坐等上述条件的自然具备。我们要本着以往的经验 and 作法，积极创造条件来开展研究工作。继续争取各个地区各级领导的支持，充分发挥学会的作用，团结全体会员和各方面的研究人员，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结合各自的业务，积极主动地进行研究工作。

在进行研究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在正确思想指导下，认真贯彻党的有关方针政策。这些在全国六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赵总理的报告中都做了明确指示。内蒙古社联全委扩大会议，也发出了“做好学会工作，开创我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的号召，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双百”方针。扩大会议认为我学会一九八三年重点科研课题是可行的，那就是：继续积极搜集、整理达斡尔历史资料和文学遗产；组织撰写有关论文；配合有关单位在重点地区知识分子和干部中试教达斡尔语记音符号。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我们在呼和浩特召开过学会理事扩大会议，对学会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并对今后工作进行了研究。除总的指导思想和重点研究内容按上级精神外，曾对研究项目提出过具体要求。在历史方面，以断代史研究为主；采取由近及远，先易后难的方针。在近代史的研究中，应加强革命史的研究，方法上先从具体材料入手，在充分掌握史实的基础上再作系统的研究。结合达斡尔族史的研究，曾对族源问题，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等进行认真的研究。在语言方面，一方面进行记音符号的试教试用，总结经验，使之更加完善。另外也要对语言本身进行必要的研究。在文学方面，当前以搜集整理民间文化遗产为重点，也搞些新内容的文学创作。还着重提出，要重视经济问题的研究，以